

从服装变迁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妇女与国家

史 春 风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 对于服装之美, 经历了从“制服”为美到“花衣服”的过程。尽管对于服装之美, 不同阶段人们的认识有所不同, 追求的时尚也有区别, 但是, 对于新中国的妇女而言, 她们并没有忽视美, 而是在不断地认识和寻求美。新中国妇女服装变迁的背后, 是国家在思想意识领域或隐没或彰显的引导。与此同时, 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也影响和制约着新中国妇女的服装变迁。新中国妇女服装变迁的过程, 凸显了妇女与国家命运的关联。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 服装变迁; 妇女

中图分类号: K 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2013)04-0115-08

服装是一种文化符号。它作为人类物质生活中的一大要素, 是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最直接、最生动的反映。法国美学家罗兰·巴特认为:“衣着是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 它是处于纯粹状态中的语言……时装是在衣服信息层次上的语言和文字信息层次上的言语。”^[1] 其言当为不虚。服装从其起源之际, 就不仅具有蔽体、御寒的实用功能, 同时人们也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 宗教信仰、政治取向、社会地位和身份识别以及多种文化心态等内容都蕴含其中, 具有鲜明的社会功能。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妇女的服装曾经过了一段饶有兴味的变迁史, 在这一变迁过程中, 凸显了妇女与国家命运的关联, 个中状况耐人寻味。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妇女服装变迁

1. “干部服”、“列宁装”的时尚

新中国成立之初, 在“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以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为中心”, 使广大妇女获得进一步的解放的思想号召下, 中国妇女开始走出家门, 积极参加社会生产。正当当

时一篇文章中所描述:“这原来是一个新时代呵!”“新中国就有这样的魔力, 使她的儿女们感受到自己属于人民、属于国家, 应该在人民, 在国家的眼中, 显出是一个更有用处的人。大家谈论着家庭妇女, 在家庭里的人们也谈论着自己, 她们提到参加生产事业, 成立家庭生产合作社, 提到办托儿所、开农场。”^[2] 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 从前以“大门不出”为道德, “搽油敷粉”为体面, 被迫与社会隔绝的妇女或被动或主动开始投身于国家的社会生产与建设。在这样一个时代, “妇女不仅是生产的参加者, 而且是生产的领导者。她们在家庭经济生活中占极重要的地位, 离开妇女不行, 谁敢轻视她们!”^[3]

就在这样一个“一切改变了, 天变成了地, 地变成了天, 十八层地狱底下的女工也要把身翻, 样样事情都来了个‘大翻个’”^[4] 的时代, 中国妇女也一改从前“当窗理云鬓, 对镜贴花黄”的传统, 诸多行为观念发生了改变。在天津, 受到教育的女工们觉悟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们女同事已由弯弯的曲发, 变为

收稿日期: 2012-10-09

基金项目: 北京大学校内立项

作者简介: 史春风(1971-), 女, 山西阳泉人,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清汤挂面式的发型。我们尽量集中思想在学习上,以求进步,已经不再注意外表的美观了。”^[5]石家庄的纺织女工们开始了劳动红旗竞赛,“过去下班前一两个钟头,就可以看到女工们梳头洗脸盼着下班。自打竞赛以来后,不顾头,不顾脸,弄得满身花毛,像个雪人似的,也忘了打扮。有人问道她们时,一个叫权平金的女工说:‘咱们是上班干活来了,也不是梳头洗脸来了,管他好看难看啦,竞赛要紧!’”^[4]

一个崭新的、充满变革的时代来临了,新中国的人们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力求接受各种新鲜事物,力求使自己从各方面适应新的环境。欢迎新的,扬弃旧的。带有强烈的文化意蕴和社会功能的服装也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发生变革。传统的、“旧”的装束作为一种被新社会彻底粉碎的、与旧社会生活相联系的可憎恶的东西也随之被抛弃。“当时如果有一个穿花旗袍的是会被人看不入眼的”^[6]。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干部服(其后为列宁装)迅速成为时尚。

“干部服”(制服)产生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艰苦年代,革命的利益以及环境因素、经济条件使得革命者无暇讲求个人生活舒适、讲求梳妆打扮,粗朴的干部服成了革命的象征。特别是那些英姿飒爽的中国女兵——穿着士兵服装的年青姑娘的出现,曾经震惊了世界。她们所代表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同样引起人们的无限的尊敬和景仰。人的本质属性在于他的社会性,失去了社会人就难以生存。因此,作为个人而言,都会尽力向有利于自身的群体靠拢,模仿这个群体成员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乃至着装。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政府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人民钦佩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艰苦朴素作风,怀着景仰和羡慕的心情来从一切方面,自然也从服装方面学习我们”^[7]。脱下象征“旧社会”、“旧的生活方式”的旗袍、裙装,穿上蓝灰色的干部服(20世纪50年代由于受苏联服装影响,又加上了列宁装),虽然色彩单调,但是对于身处其时的新中国妇女而言,这样的装束意味着一种崇高的政治信仰,一种对新时代、新中国由衷的渴望,同时也是一种对社会认同的强烈寻求——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我”属于这个崭新的国家,这个崭新的时代,“我”是这个时代的主人。于是,线条优美的旗袍、裙子被压到箱底,蓝色、灰色的干部服、

列宁装成为时尚,男女皆然。

毫无疑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制服在一开始是被当作代表“时尚”与“美”的服装被人们所崇尚的。不过,这样的观念在新的时代中逐渐发生某种变化。

一种新制度的诞生随之而来的是新道德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形成。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一切崇尚“为了新中国而奋斗”的当时,节约、艰苦、朴素成了新社会所倡导的新道德,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人对“朴素”两个字的含义发生了“误解”,认为只有穿蓝色、灰色的制服才算朴素,穿其他颜色和式样的衣服,就是奢侈、浪费,“甚至认为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有了新衣服都不敢穿。这中间,有一部分人是真心“热爱党和国家干部的朴素作风,觉得穿蓝布制服经济实用,所以喜欢穿”,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喜欢穿蓝制服,“但是由于怕人家说闲话,也只好穿蓝制服了”^[8]。结果,大家一片蓝色、灰色和黑色,“小姑娘打扮得像男子汉,青年小伙子穿得活像个老头子”^[9]。

不过,千篇一律的蓝灰色的制服并没有完全压抑新中国的妇女们对美的追求。在当时“苏联妇女是全世界妇女的榜样,苏联妇女的道路就是全世界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全国上下一致把“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作追求之时,在当时介绍苏联妇女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新中国的人们对苏联妇女的“美”的向往:“戏院里,你会遇到一些专门到盥洗室换一双上好高跟鞋才踏进剧场的妇女,散戏后再穿了普通皮鞋走回去。女艺术工作者皮包内总得带有脂粉小盒,在宴会或者集会中途拿出来擦用。她们以为这是对于别人的礼貌”。“苏联的妇女杂志上如今也常介绍一些时装或睡衣的样子,百货公司的衣服剪样的摊子上常挤满雇(顾)客”,“因为她们的经济文化生活已提高到相当程度,所以有这种现象”^[10]。

2. “姑娘们,穿起花衣服来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崭新华章。在生机勃勃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以无比高涨的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新中国成立之初5年的历史,“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五年都走得快。昨天走过的地方过些天就不认识了,昨天的文盲过些天变得会写信了。新的建设计划不断地提出,也不断地

在做到;尚未做到的总会比预期更快的做到。”^[6] 1956年,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国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也取得巨大成就,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所规定的主要指标。按1952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指标。在列入“一五”计划的46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生铁、钢材、水泥、纯碱、客车、棉纱、棉布等27种产品的产量已经达到或超过“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指标。农业方面,虽然遭受了自然灾害,1956年的农业总产值依然接近“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水平。物质生产的丰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文化生活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包括对单调的、男女不分的服装产生了不满足,开始追求与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相适应的服装。1954年以后,要求穿“花衣服”的声音开始多了起来。

1956年1月1日,新年伊始,《中国青年》第1期发表一篇题目为《姑娘们,穿起花衣服来吧》的文章。文章指出:“在经济条件的许可下,适当地讲究一些穿着,这种建筑在劳动基础上的改善生活,与剥削阶级的不劳而获,只讲吃穿是不同的。”“我们提倡穿花衣服,讲生活五彩缤纷,就会使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变的更加美丽”。在文章的开头,编者特地加按语提出:“新年已经到了,我们在快快乐乐过新年的时候,姑娘们,就从此穿起你们的花衣服来吧!”^[11] 2月2日,《人民日报》报导,2月1日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召开座谈会,专门讨论改进服装式样和色彩的问题。座谈会中,大家都认为“目前的服装式样和色彩太单调,不能反映今天中国人民日益美好、幸福的生活”,“主张根据经济、实用和美观的原则,来改进服装式样,增加服装的色彩”。同时,为了改变目前服装单调的状况,提出“必须打破阻碍改进服装问题的一些错误认识,要把人民群众的爱美同资产阶级的奢侈腐化严格地加以区分”^[12]。由此,政府开始倡导“改良服装”。一段时期内,服装问题成了报刊杂志关注的重点。

然而,穿“花衣服”的呼声与此时全国正在进行的清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培养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发生了冲突,也与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倡导的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精神发生冲突。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过程中,一部分人把“穿得好”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挂钩,认为讲吃讲穿就是

腐化堕落,就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于是,那些讲究吃穿的人遭到人们的讽刺、嘲笑,而被扣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大帽子更是让许多人对穿“花衣服”心生畏惧。1955年第6期的《新中国妇女》刊登了一首诗《花布的烦闷》:“我是国产的花布,人们夸我‘式样美观、质地牢固’,可是姑娘们对我的待遇,真使我感到苦闷。”“姑娘们买到我也确实真正喜欢,将我缝成一件如意的新装。有谁知道他们为了什么,偏偏在我外面套上一件蓝布衣裳。”“我听见两个姑娘轻轻地在讲:瞧,咱俩穿件花衣裳,别人硬说是‘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哼!还有人说咱‘轻浮’、‘不像样’!”“啊!姑娘们原来是受了这些言论的影响,我花布可算遭了殃,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看不见灿烂的阳光。”诗的最后一节写道:“姑娘啊,姑娘,你不必怕人家说短论长,请你赶快脱下罩住我的蓝布衣裳,让我把你打扮得更漂亮。”^[13]

1955年前后,关于穿花衣服到底是否是“资产阶级思想”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1955年,《新中国妇女》第3期发表郁风的文章,文章尖锐地提出:“我们难道可以说蓝色、灰色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其他颜色以及图案花纹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吗?”^[6] 1955年第3期《中国青年》发表来信综述《不要乱扣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文章指出:“有些青年把在可能条件下适当地改善生活,与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混淆起来,把一些属于正当的改善生活的现象,认为是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作风。结果在一些青年思想上造成错觉,认为‘吃好些,穿好些,就会腐化堕落’,致使一些本来应该而又有可能改善生活的人也不敢改善了,有的已经做好了新衣服也不敢穿,甚至因此不安,影响了工作和学习。”“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人民享受最美好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我们反对整天只讲究吃好穿好而不好好工作和学习,也不主张个人生活的改善远远超过周围群众的生活水平,但是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适当的改善自己的生活,吃得好些穿得好些,则是完全合理的。”^[14] 正是这一背景,引发了人们对妇女着装的关注和讨论,继《中国青年》刊发《姑娘们,穿起花衣服来吧》之后,郁风在《中国工人》上发表《打扮起来吧》的文章指出:“在历史上从来还没听说人民服装会成为一个问题。正当我们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连全国这么大片土地都要绿化,难道人们

自身就情愿永远是灰色的吗？”^[15]《中国青年》1956年第6期，孙轶青发表文章《让我们的服装丰富多彩》，提出“在服装的讲究与打扮方面，哪些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哪些不是，必须作具体分析”。“辨别是非的界限主要有两条：一是要看经济来源如何，是否奢侈浪费；一是要看美的要求是否健康。只要合乎这两条，即使穿得再漂亮一些，也不能算作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表现。”文章充满激情地写道：“人们对美的要求，不仅表现在对优美的音乐、诗歌、绘画、文学作品以及其他艺术作品的爱好和欣赏方面，不仅表现在对祖国大自然的热爱、对日常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美化方面，而且也应当表现在对日常装束的讲究与打扮方面。各式各样的，色彩调和的优美的服装，可以更好地表现出每一个人的豪放与纯朴、严肃与活泼、刚毅与柔和、高尚与清雅等等优美的性格和精神面貌，可以给人爽朗、豁达、鲜明、欢乐的情感，可以引起人们对优美的自然景色的回忆，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优美的服装对于新一代——少年儿童的美的教育，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只有那些能够使生活丰富多彩，能够表现人们高尚的感情和对生活的热爱，能够鼓舞人们积极向上，朝气蓬勃，有益于伟大集体的事物，才是优美的事物。这种审美观点，是我们应该加以提倡的。”^[7]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副部长的杨之华也著文提出：“我们要大胆地穿上自己喜爱的漂亮新装，使我们的装束能表现出我们的自由、幸福、平等、美满、活泼的生活。但是，我们反对花太多的钱去添置太考究、太豪华的服装，因为目前我们一般的生活水平还不太高，这样做会影响我们正常生活的安排；我们也反对为了漂亮穿着妨碍我们日常劳动和身体发育的服式；我们更反对为了装饰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致影响生产、学习和工作。我们提倡：穿花衣服的人要有新的先进的思想，一个思想进步、热爱劳动、努力学习、品质优良、工作很好的妇女，再穿上一件漂亮的衣服，就会显得更美了。”^[9]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文革前夕的报刊杂志上，经常推荐适合各个季节的新式样服装，笔者随机翻阅当时的杂志，封面、封底随处可见那些衣着光鲜的漂亮女性。例如，1956年第7期《中国青年》封底，是北京服装鉴定会上青年妇女们试穿各种式样服装的照片；1956年第8期《中

国工人》的封底，是身着漂亮裙装、脚蹬高跟鞋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的先进生产者；1960年第22期《中国妇女》封面，是一位穿着漂亮花衣服的被称作“群众知心人”的农村党支部女副书记；1962年第8期《中国妇女》封面，是穿着时尚的百花奖最佳女演员获得者祝希娟。在改良服装的过程中，一些人甚至为了跟风，到处借钱买衣服，还背了一身债。有的机关女青年，因为“一天换好几套衣服，一星期把几个晚上都用在溜大街、选花布、跑公司、看式样上面，把宝贵的时间都浪费了”而遭到人们的批评。^[16]

总之，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讨论，加上政府不遗余力的宣传和支持，改良服装的倡议得到了认可，5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对于新中国妇女来说，穿上漂亮的“花衣服”已经不再被侧目，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二、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服装变迁看新中国妇女

“我们的政治原则就是要建设美好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美好的生活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就是每个人都要有美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条件，使大家能够丰衣足食而心情愉快，使大家的兴趣能够满足，个性能够发挥，这样大家就能够在他的工作上有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不是要忽视美的东西，而是要欣赏美的东西。要理解自然界的、人类文化上一切美的东西，要创造前所未有的美的艺术、美的文化、美的生活。”^[17]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对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的人们而言，他们并不是排斥美，而是追求美，这种美不仅仅是外表的，穿“花衣服”的外表美，也包括内心的、品格的美，健康的美。

什么是真正的美？穿上漂亮衣服是不是就代表美？在改良服装的过程中，诸如此类的讨论随处可见。“只有那些能够使生活丰富多彩，能够表现人们高尚的感情和对生活的热爱，能够鼓舞人们积极向上，朝气蓬勃，有益于伟大集体事业的事物，才是优美的事物。这种审美观点，是我们应该加以提倡的。”^[7]“我们不仅要穿上美丽的衣服，而更重要的是要树立起道德品质优良的独立人格”^[9]。这就是新中国的人们对美的理解、对美的认识。所以，在宣传改良服装的同时，当时的报刊杂志上，也在尽力宣传那些热爱劳动、工作出色的劳动者们：忘我的工作之后，虽然她们“还没有换

上漂亮的衣服,没梳光头发,更没有来得及擦上香粉”,这更是“真正的品质美,使人幸福的美”。^[18]

新中国刚刚成立,受尽蹂躏、历经奋斗终于翻身作了主人的中国人民为了尽情表达对这个新社会由衷的热爱,几乎不约而同地穿上了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军人的制服——蓝灰色服装,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不爱美,而是对美的另外层次的追求。1961年2月,毛泽东为中国女民兵题写了“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诗句,对此,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如此阐释:所谓“‘飒爽英姿’,如果译成现代语,便是光明磊落、生动活泼的英俊姿态。这样英俊的姿态,身上穿着素朴的制服,手里拿着五尺长的步枪,整齐严肃地在清早的操场里操练,有旭日初升的阳光照耀着,这是多么朝气蓬勃的形象呵!我们从这里不可以充分领取革命的现代美感和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吗?”“这是要我们不爱安逸爱劳动,不爱偷闲爱学习,不爱享受爱生产,不爱粉饰爱朴素,不爱散漫爱纪律,不爱柔弱爱刚健,不爱妥协爱革命,不爱自私爱集体,不爱孤芳自赏爱团结一致,不爱苟全性命爱反抗侵略,不爱故步自封爱比学赶帮,不爱红在表面爱红在内心……”。^[19]穿上素朴的制服,对于新中国的妇女而言,是一种对“飒爽英姿”的美的认同,是对新社会、新生活的无限向往,是一种令其内心满怀骄傲与自豪的“美”。

当然,对于普通女性而言,这种颜色单调的制服能给人们带来新鲜感,带来某种内心的满足,但是却不能长久。随着新中国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对“美”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了。在改良服装的倡议提出之前,大街上爱美的妇女们已经在设法展示自己的美了。“不少梳辫子的在辫梢上面系着彩色的绸带”,“当人们已经要求在生活中多看到一些美丽鲜明的色彩,而又不肯突破服装一般化的习惯,就只有在占全身装饰面积最小的辫子梢上打打主意了”。^[6]也有不少妇女偷偷做了花衣服,却在外面罩着蓝制服,靠着领口袖口露出来的冰山一角展示着自己的美。

经过服装问题的大讨论之后,在政府的支持之下,50年代中期以后,新中国妇女们几乎可以毫无顾忌地追求服装之美了。1956年春北京召开服装博览会,收集了几百种服装样式:“经过加

工的江南农村妇女爱穿的‘作裙’,配上无领衬衫,将是少女们俏丽的春装。双襟小短袄,配上较长的裙子,适宜于长得丰满的妇女作便服。敞领、前胸饰有花边的长旗袍,将是潇洒的晚礼服。还有男孩子们的小花背心,女孩子们无袖的衣连衣裙等,式样很多。”^[20]几乎同时,上海的几百名服装裁剪师和缝纫技工也为即将举行的妇女儿童服装展览会赶制了300余种新装。“新设计的妇女服装有250种,其中有50多种便服、20多种节日服、10多种晚会服,还有专门为孕妇设计的衣服和工厂女工、女干部、女拖拉机手、公共汽车女售票员、女教师、女保育员等不同职业妇女穿的40种工作服”。“在50种新的童装中包括从婴孩到学龄儿童穿的各种春夏秋三季服装。特别新颖的有婴儿穿的‘日光衣’和把裤子和裙子合并设计的女孩‘裙裤’”。^[21]到1958年,依然有丰富的服装商品供应市场:“纺织品中的新品种有秋夏两季用来做服装的宽面花布,很受姑娘们欢迎。还有带香味的布,可以做夏季服装。飞利绸和人造毛及柞丝交织绸缎,看来很似毛织的凡尔丁,很适合做西服和裙子。”^[22]1959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描写了一位有三个孩子的农村妇女张彩花:“她打扮得非常朴素:梳两根光溜溜的辫子。上身穿一件府绸的白底小蓝花的衬衫,圆领,露出半截颈脖。裤子是亚麻布的,米黄色的。我知道这种布料的裤子夏天穿很风凉,但一穿就绉起来。可是张彩花今天穿起来,却是笔挺的。脚下是白袜和方口黑布鞋。朴素,非常朴素,但光彩夺目。”^[23]60年代初的报纸刊物上,仍然不时介绍和推荐包括旗袍在内的各样新式女装。

可以这样说,尽管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对于服装之美,不同阶段人们的认识有所不同,追求的时尚也有区别,但是,对于新中国的妇女而言,她们并没有忽视美,而是在不断地认识和寻求美。

著名妇女研究专家李小江教授认为50年代中国妇女处于“全国解放、全面收获、全面被社会认同和被社会接受”,妇女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的时期,这一时期,国家的动员和干预力量无与伦比。^[24]就服装而言,服装的流行与人们的审美需求有关。但是,审美又并非单纯由个人心理因素可以决定,它同时也是政治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新中国妇女的服装变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国家的思想意识形态

导向以及经济发展现实状况的影响,尽管这种力量有时隐没,有时彰显。在这一过程中,妇女被潜移默化或者主动性地被引导、动员乃至被塑造,中国妇女与国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紧密关联。

第一,新中国妇女服装变迁的背后,是国家在思想意识领域或隐没或彰显的引导。

新中国成立,在到底如何着装的问题上,国家并没有主动加以引导。但是,在国家的大力倡导下,朴素、勤俭、节约,为恢复经济而艰苦奋斗成为风气,而革命战争年代沿习而来的政府机关干部素朴的着装在这时已经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表率,于是,群众以此为榜样,制服随之流行。

50年代中期,人民群众由于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而自发提出了“穿花衣服”的要求,当这一呼声与国家倡导的艰苦朴素作风,以及其时正在进行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发生观念上的冲突之时,如前文所述,国家在舆论引导上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享受最美好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不是让群众吃苦受累。这样的舆论导向推动了妇女服装改良的顺利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25]。为贯彻这一方针,1957年9月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妇女运动方针。如何理解勤俭持家和穿“花衣服”之间的关系?勤俭持家是不是就是要降低人民生活水平,过苦日子?穿漂亮点是不是就是浪费?这也是这一时期人们经常思考讨论的问题。1958年,《中国妇女》发表编辑部总结,提出:提倡勤俭持家,“是为了促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在继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继续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合理消费,如买一块花布,吃点儿好菜,买几件高级商品,甚至有人在人家结婚的时候,买一张床,穿一身漂亮衣服,也批评是浪费,这样理解勤俭持家是错误的”。“在宣传勤俭持家以前,在小部分职工中,确实有铺张浪费现象,有比吃比穿比阔气的风气,甚至不爱惜国家财产,损公肥私。我们所反对的,正是这种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26]勤俭持家不是让大家不穿漂亮衣服,不打扮,而是

主张量力而行,反对铺张浪费。

直到“文革”爆发之前的关于消费观念、关于服饰包括发型问题的讨论中,《人民日报》仍然发表文章指出:“随着建设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正在而且应该丰富多彩起来。服装专家和理发师们考虑如何使衣着、发型大方美观,姑娘们、小伙子们想把自己修饰得清洁整齐,都是容许的。”^[27]“人民群众拿自己的劳动收入,购买自己需要的各种各样的商品,或者用于其他方面的消费,这完全是经济生活中正常的现象。不能把人民群众的正常消费同剥削阶级吃喝玩乐混为一谈。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那种剥削别人、不劳而食、只求享受、吃喝玩乐的腐朽生活,我们当然是反对的。但是,这同劳动人民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根据自己的可能条件,把生活过得美好一点,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人民群众用劳动所得的正当收入,置几件花衣服,让全家穿戴得整洁美观一些;或者在劳动之余,出去游玩游玩,下个饭馆,以及烫发、照相,等等,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的,是合乎常情的。对于人们力所能及的正常消费,是不应当加以干涉和非议的。”^[28]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一直是国家极力宣传倡导的方针。那么,如何看待勤俭节约与改善生活的关系?正是由于国家这样的思想引导,新中国的妇女才可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大大方方地穿上漂亮衣服,展示女性之美。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由于从建国之后一直以来的倡导,也由于榜样的力量(毛泽东、周恩来、雷锋,包括其他一些先进人物的生活作风),“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在许多人的理解中,仍旧定位为一心奉献、不讲吃穿,穿花衣服就是“不进步”。因此,不敢穿漂亮衣服,或者内穿花衣服外面罩上蓝灰制服,甚至给新衣服打上补丁以示“进步”、“革命”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些都对新中国妇女服装变化产生了影响。

第二,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也影响和制约着新中国妇女的服装变迁。

如上文所述,实际上,至少从50年代中期至“文革”爆发前夕,新中国妇女在着装问题上并非人们从前印象中的“蓝灰一片”,算得上色彩较为斑斓、款式也较为多样,而且这是由国家着力倡导和影响的。但是,为什么一提到新中国建立早期的妇女服装,我们就会有如此印象呢?

应当指出,新中国妇女服装的变迁与国家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有着现实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棉花产量和棉布供应量都有很大增加。1952年全国生产棉花129万多吨,达到1949年的290%以上,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936年)的84万多吨还高出52%。棉布在1950年全国市场上的供应量是5800多万匹,1953年就达到1亿3000多万匹,比解放前最高销售年度的供应量也多得多。但是,同一时期,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也大大提高,以棉布为例,1953年产量比1952年虽然增加了27%,可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棉布的购买力却更快地增长起来,以致同一期间的市场销量竟增加了47%。由于棉花和棉布生产的速度赶不上人民需要的速度,造成了生产和消费增长速度不相适应的情况。为“未雨绸缪”,1954年9月15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棉布的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和棉花的计划收购。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纺织工业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棉花的供应,保证棉布能够按照国家的计划生产和分配,并进一步消灭市场投机和稳定物价。

为贯彻棉布统购统销和棉花统购政策,国家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当时提出的“穿花衣服”的呼声:“例如城市人民一般地都存有一些衣服,现在还是可以穿的,就应该多穿一些时候,少作一些新衣;就是在缝制新衣的时候,能作旗袍的就作旗袍,能穿裙子的就穿裙子,改变男女老少一律都穿蓝布制服的习惯,也会节约很多布料,并且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为丰富多彩。这些办法都是可以采用的和应该采用的。”^[29]

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勤俭建国”的方针,倡导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各个消费者的利益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在穿衣问题上,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打算,提出有旧的,就少买或不买新的;有破的,就尽量修整再用。当时国家除了提倡旧衣改制以外,还积极宣传和推广省布的服装样式。“过去城市妇女多半穿旗袍,做一件旗袍比做一套干部服至少可以省一半布。中式褂子,无论男女,都比干部服要省布。所以应该提倡今后在添制衣服的时候,多添制这些省布的式样的服装,并且尽可能量体裁衣,不要浪费。”^[30]之后几年中,利用碎布巧制服装、旧服装翻改,漂亮而又省布,同时经过改良的

旗袍成为报刊上经常为妇女们推荐的新装。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一些有条件购买新衣服的人们也打消了购置服装的念头。

不过,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由于受到国家政策的限制(1960年以后,由于棉花大量减产,不得不削减民用布用量,几乎所有纺织品一律凭票供应),加上自身经济条件所限,“人们在购买纺织品的时候,都要考虑充分的利用。例如买布要考虑布面要宽,要结实,衣服做好以后要能多穿几年,所以在色彩上也只能是选用中性的比较朴素的颜色,例如黑色、灰色、蓝色或一些比较耐脏、耐洗的颜色。从这时开始,原来的蓝、黑、灰服装的地位更进一步巩固了”。^[31]多年从事服饰研究的华梅曾回忆:“1960至1963年间……有城市户口的人日常生活必需品,不是要凭票,就是要记本。布票一年一人一丈七尺三寸,够做一身衣服的;棉布则还要加上每人配给的棉花票。黑白棉线按‘把’卖,要记在一家一户的副食本上,就是扣子不要票,不过也很难买到,而且式样单一。在这种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人们强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着装规则: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32]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作风的提倡,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个人经济状况的限制,对于很多妇女而言,她们实际上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喜欢的服装,而是受到诸多现实因素制约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少数有一些经济能力的人之外,实用、朴素、色彩单调成为人们更为典型普遍的着装风格,特别是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妇女的服装又逐渐重新回到“蓝灰”的原点。

总之,新中国妇女的服装,也曾经是色彩斑斓,有过多样选择的。不过,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了新中国妇女的着装,使其并不能毫无顾忌地展现女性之美。至于“文革”爆发之后,“十亿人民一款衣,三种颜色盖大地”的“革命服装”的出现,则自有其更深层意蕴所在,非本文所能述及的了。

参考文献:

- [1]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M].董学文,王葵,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1-22.
- [2]杨刚.春雷起蛰[J].新中国妇女,1949(3):28.
- [3]帅孟奇.革命与家庭[J].新中国妇女,1949(3):10.
- [4]陈森.红旗女工——记大兴纱厂的红旗竞赛[J].新中

- 国妇女,1949(1):16-18.
- [5]杨锦漪.天津女邮工的生活[J].新中国妇女,1949(1):31.
- [6]郁风.今天的妇女服装问题[J].新中国妇女,1955(3):31-32.
- [7]孙轶青.让我们的服装丰富多彩[J].中国青年,1956(6):20-22.
- [8]陈长馨.服装问题[J].中国工人,1956(4):35-37.
- [9]杨之华.谈谈服装问题[J].中国工人,1956(6):21.
- [10]子冈.劳动·文化·美丽——苏联妇女印象[J].北京妇女,1949(2):24.
- [11]姑娘们,穿起花衣服来吧[J].中国青年,1956(1):38.
- [12]青年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召开座谈会讨论改进服装式样和色彩的问题[N].人民日报,1956-02-02(3).
- [13]万山.花布的烦闷[J].新中国妇女,1955(6):29.
- [14]不要乱扣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J].中国青年,1955(3):32.
- [15]郁风.打扮起来吧[J].中国工人,1956(4):38.
- [16]不要勉强别人改进服装[J].中国青年,1956(12):39.
- [17]蔡仪.我们为什么需要美[J].中国青年,1956(15):15-16.
- [18]袁宝忠.关于“真正的美”的讨论[J].青年团员,1956(11):22-23.
- [19]郭沫若.不爱红装爱武装[N].人民日报,1964-04-25(7).
- [20]新颖的服装式样设计出来了[N].人民日报,1956-02-25(1).
- [21]上海赶制300种新颖服装[N].人民日报,1956-03-04(1).
- [22]丰富多彩的日常用品[N].人民日报,1958-08-09(6).
- [23]石方禹.张彩花[N].人民日报,1959-11-17(8).
- [24]李小江.50年,我们走到了哪里——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历程回顾[J].浙江学刊,2000(1):59-65.
- [2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40.
- [26]正确认识女干部勤俭持家的意义——关于勤俭持家问题讨论的总结[J].中国妇女,1958(7):12-13.
- [27]梅原.头发·服装·美[N].人民日报,1964-04-20(6).
- [28]关于勤俭节约和改善生活问题[N].人民日报,1965-05-30(2).
- [29]贯彻棉布统购统销和棉花统购的政策[N].人民日报,1954-09-17(1).
- [30]人人都要节约棉布[N].人民日报,1957-08-20(1).
- [31]安毓英.中国现代服装史[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81.
- [32]华梅.服饰情怀[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3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the Stat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en from the Vicissitude in Women's Clothing

SHI Chunfe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omen's aesthetic of their dresses changed from preference for wearing uniforms to florid dress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omen did not ignore the beauty of clothes. They were instead in constant pursuit of that beauty. Behind the vicissitude in women's clothing is the ideological guidance of the state, implicit or not. In addition, the national economic reality is also an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 The vicissitude in women's clothing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mbodies the association of women with the fate of their country.

Key words: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cissitude in clothing; women

(责任编辑 子清)